



JLM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Music Studies

JLMS, Vol. 1, No. 1, 2026, pp. 91-97.

Print ISSN: 3134-8130; Online ISSN: 3134-8149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lm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60109ictrs>



引入、建构与超越——评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

潘书皓 (Pan Shuhao)

摘要:《听觉叙事研究》通过引介“音景”“聆察”等西方听觉理论，为国内叙事学提供了重要的话语工具，弥补了长期以来国视觉中心主义导致的理论缺失。然而，该书并未止步于理论移植，而是立足中国传统哲学中感官交融与以听统感的认知模式，对听觉理论进行本土化重构，并通过“重听经典”发掘中国文学中潜在的听觉经验，建构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听觉叙事话语体系。最后，该书通过将中国哲学中“万物自生听”的本体论命题引入听觉叙事，突破了西方“视觉—听觉”二元对立框架，从而实现对西方听觉转向理论的超越。总体而言，《听觉叙事研究》不仅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感知维度，也为中国叙事理论的主体性建构提供了重要路径，但其理论在实践层面的操作性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听觉叙事研究》；傅修延；中国听觉叙事话语

作者简介:潘书皓，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电子邮箱：lincco145@163.com。

Title: Introducing, Constructing, and Transcending: A Review of Fu Xiuyan's *A Study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Abstract: Fu's *A Study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introduces key western auditory theories such as “soundscape” and “auscultation,” providing essential conceptual tools for Chinese narratology and addressing the long-standing imbalance caused by visual centrism. However, rather than merely transplanting these theories, Fu reconstructs them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Received: 20 Mar 2026 / Revised: 02 Apr 2026 / Accepted: 12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e 2026.

traditions, particularly the notions of sensory integration and auditory primacy. Through a “re-listening” to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uncovers latent auditory experiences and establishes a culturally grounded framework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Finally, by introducing the ontological proposition of “Spontaneous Resonance of All Things” from Chinese philosophy to auditory studies, the work transcends the Western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vision and hearing. Overall, Fu’s work expands the perceptual scope of narratology and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tinct Chinese theoretical discourse, although challenges remain in translating its metaphysical insights into concrete methodological practices.

Keywords: *A Study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Fu Xiuyan; Chinese auditory narrative

Author Biography: Pan Shuhao,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Yanbia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music, American Asian literary studies. E-mail: lincco145@163.com.

作为中国著名的叙事学家，傅修延在叙事学理论、中国古典文学及比较文学等领域成果斐然，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听觉叙事研究》一书是傅修延对中西方文学研究领域的视听失衡现象以及听觉转向的重要回应，对于当代国内叙事学界打破西方叙事学领域视觉导向话语体系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意义。自 2021 年出版以来，该书在国内引起热烈反响，不仅荣获国家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和江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还被许多知名学者视为确立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叙事学及其主体性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听觉叙事研究》全书主要包含五大部分，分别为“听”与“讲”的本体论思辨、“景”与“聆”的理论引入和阐释、“听”之行为类型及其叙事功能辨析、中西听觉文化对比以及“空间—阅读—感应”维度中听觉经验的生成机制与审美实践。其探讨内容颇为广泛，涉及语言学、文学批评、哲学与文化等多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在整体理论架构上，该书呈现出清晰的逻辑演进：首先，引入以“音景”（soundscape）和“聆察”（auscultation）为代表的西方听觉转向前沿理论概念；其次，通过对这些移植概念的汉语语境化处理及基于中国经典文学的理论阐释，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听觉叙事话语体系；最终，通过回应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关于中国人是“听觉人”的论断^①，实现对西方听觉叙事研究的本体论超越。因此，《听觉叙事研究》这一著作对于中国叙事学领域的价值和贡献并非仅限于对西方听觉转向理论的引入和移植，抑或是提出类似于“聆察”或“语音独一性”（the uniqueness of voice）的听觉叙事概念。更重要的是，其作者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感官交融的听觉观出发，建构了一种具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听觉叙事研究范式，这在本体论上是区别于甚至是超越西方基于视听对立二分法的听觉转向思潮的。

^① 严格而言，“听觉人”并非麦克卢汉直接使用的概念，而是傅修延依据麦克卢汉关于不同文化具有感官偏向的论述，尤其是其将中国文化视为偏重听觉感知的观点所提炼和概括出的表述，用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听觉思维特征。

一、引入西方听觉理论

在导论部分，傅修延指出，国内听觉叙事研究当前面临的障碍不是学界由来已久的“失聪”之疾，而是由此痼疾引发的“失语”之症，即缺乏理论基础与“相应的话语工具”（8）。事实也正是如此，西方学界的听觉转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而后经历数十年的理论积淀，在进入21世纪后已然从呼吁听觉转向的思潮转变成声音研究（sound studies）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相较于国外坚实的听觉理论基础，国内的听觉转向虽势头正盛，但由于起步较晚，因此缺乏理论化和体系化的成果积累。有感于此，傅修延在书中引入和移植了一批西方听觉研究的前沿理论概念，以弥补国内听觉叙事在研究工具上的空白。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反响最为热烈的当属傅氏对谢弗（Murray Schafer）的“音景”与卡迪-基恩（Melba C. Kean）的“聆察”这两大概念的引介。

音景，即声音景观、声音风景或声音背景的简称。这一术语是傅氏从谢弗的著作《音景：我们的声音环境以及为世界调音》^②（*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中移植而来，以平衡学界对叙事作品的视听感知。由于视觉文化对听觉的长久性压迫和习惯性忽略，汉语中许多原本表示视听感知，乃至多种感知方式并存的词汇，如今几乎成为了对视觉感知的专指。因此，傅氏从声学领域引入“音景”这一概念，希望在学术范畴上建立与主要表示视觉维度的“图景”（landscape）相平行的听觉叙事概念。在音景理论的引介方面，除了对“定调音”“信号音”及“标志音”等有声音景的介绍和阐释，傅修延还在书中着重探讨了无声与声音帝国主义概念，进而向读者揭示了音景的空间维度和权力属性。在文学叙事中，音景不仅仅只是一种符号化的叙事陪衬，服务于声音事件的开启和关闭；恰恰相反，在许多时候，音景通过向故事人物施加压迫实现从“故事背景上的声音幕布”（144）反转为不容忽视的叙事主体。此外，傅氏还指出音景在文学作品鉴赏中的不可或缺性：音景的“拟声”与“拟状”不但能赋予文学叙事更大的话力与审美自由，还能构建出比纯粹的视觉摹写更具想象空间的声音图画。更重要的是，音景能触发人类的听觉本能，在发生学层面上唤醒读者深层的情感共鸣与感动。

《听觉叙事研究》对“聆察”的引入严格来说并非单纯的概念移植，而是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译介。尽管作者承认聆察对应的英文术语“auscultation”来自卡迪-基恩《现代主义音景与智性的聆听：听觉感知的叙事研究》（“Modernist Soundscapes and the Intelligent Ear: An Approach to Narrative Through Auditory Perception”）一文，但在阐释聆察的内涵时主要借鉴的却是济慈的消极能力说和解构主义的倾听理论。借助这两种学说，傅氏将聆察的要义总结为聆察者需“完全敞开自身”去倾听他人，而“敞开的倾听可以换来敞开的倾诉”（167）。换言之，聆察需要人们主动开启在视觉文化冲刷下形成的“耳脸”，以一种“觉有声”的自

^②原著为英文，国内邓志勇和刘爱利译本的译名为《声景学：我们的声环境与世界的调音》，但此译本出版时间晚于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研究》。为保持与书中译名统一，本文将沿用傅氏的译法，将“soundscape”一词译为“音景”。

我意识去留意周围环境中的声响或文学作品中的声音迹象。如此一来，聆察者不仅能以被动和接受的姿态在日益喧嚣的环境中安然自立，更能获得一种被动的主动性，在安然倾听中实现动态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他者正义。

《听觉叙事研究》对西方听觉理论的引入为国内研究者们提供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与实践参照路径，对于国内方兴未艾的听觉转向思潮而言同样具有导向性。然而，这种理论引介并非无可指摘。西方学界的听觉转向从伊始阶段便是以“视觉—听觉”的二元论为根本导向，谢弗、卡迪-基恩等人提出的“soundscape”与“auscultation”等听觉概念也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视觉中心主义叙事话语的驳斥与反拨之上。这也给中国听觉叙事研究带来了一个隐患：引入或移植这些理论容易使国内听觉转向滑向西方式的视听对立困境，这一点在傅氏“纠正视听失衡”的学术旗号以及“观察—聆察”“图景—音景”等汉语听觉研究范式的建构上已初见端倪。但令人深以为幸的是，《听觉叙事研究》并未止步于理论引介，而是以中国经典哲学和文学为依托，逐渐走向建构本土化听觉叙事话语的道路。

二、建构中国式听觉叙事话语

如果说对西方听觉理论的引入为国内听觉叙事研究提供了适应运用的话语工具，那么傅修延更具开创性和原创性的贡献则体现在他对这些理论资源的本土语境化以及对中国式听觉叙事话语体系的建构之中。在《听觉叙事研究》中，傅氏敏锐地意识到，单纯的理论移植不仅会由于文化冲突导致“水土不服”，更容易让国内听觉叙事研究沦为西方听觉转向研究的附庸和分支。为此，傅修延并未止步于对“音景”“聆察”等概念的译介与阐释，而是以中国古典哲学中感官交融以及以听统感的感官认知传统为理论根基，对听觉经验进行重新编码，试图从中挖掘出属于中国人的听觉基因，进而逐步搭建起一个区别于西方理论范式的听觉叙事框架。

在引入西方听觉概念时，傅修延并未生搬硬套，而是基于中国古典听觉理论对其进行语境化处理，从而将原本带有西方理论语境的术语嵌入汉语语义系统。以傅氏提出的聆察概念为例，尽管“观察—聆察”的视听范畴在形式上呈现出与西方理论的内在对称性，但在具体内涵上却表现出对二元范式的微妙偏移。在意识到“auscultation”是卡迪-基恩从医学领域引入的术语后，傅氏在译介这一术语时，并未将其直译为“听诊”，而是选择“聆察”这一高度契合汉语语境的译法。这种翻译处理不但符合中国“视听交融”的古典感官认知基础，又借助汉语本身作为表意语言体系的内在语义生成机制，将“听”从视觉的附属位置中解放出来，转变成一种具有独立认知功能的感知方式。具体而言，《听觉叙事研究》提出的“聆察”一词，既保留了作为西方听觉概念的“auscultation”中细致倾听的意味，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聆听以察的修养意涵。

除理论层面的汉语语境化外，《听觉叙事研究》建构中国式听觉叙事话语的自觉性还体现为傅氏对中国经典文学资源的系统发掘与阐释。傅修延在导论中强调称，听觉叙事概念的

提出赋予了国内叙事研究一项新的使命，那就是“对经典的‘重听’”（25）。这也是傅氏在书中一以贯之的理论阐释思路：通过对诗词、戏曲及小说等中国传统文学文本中声音描写的细读，揭示听觉理论应用路径的同时，也发掘出中国文学长期以来所蕴含的丰富听觉经验。例如，在阐释谢弗的音景理论时，傅修延通过对柳永《雨霖铃》中雨声、蝉声、人声等声音意象的分析，展示了音景在叙事中的情境建构功能；通过解析《三国演义》中张飞怒吼吓死夏侯杰以及诸葛亮空城计的经典桥段，彰显音景的压迫性质以及声音帝国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傅氏的“重听经典”并非简单地补足中国文学阅读和研究的听觉维度，而是通过对既有文学传统的重新发现，指出中国叙事本身就潜藏着以听觉为重要支点的感知结构。当然，《听觉叙事研究》对中国经典文学的挖掘并非尽善尽美。比如，在通过文本细读阐释听觉理论和叙事策略时，书中存在多处文本素材复用的情况（如对《红楼梦》某些桥段的重复援引）。此外，相较于国外经典，书中对于中国经典文学的发掘更加偏向古典文学，对于现当代文学关注较少。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不足之处亦为后续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何在更广泛的文学谱系中，尤其是在现当代文学语境中，检验并发展中国听觉叙事理论，或将成为推动该领域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超越西方视听二分法

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中从文字体系的角度考察了东西方文化对视听的不同偏好，他认为如汉字之类的非拼音文字保留了“意义和知觉”的完形，即“听觉经验和视觉经验”的统一，而拼音字母却削弱其他感官方式，更注重“视觉统一性和连续性”（105）。傅修延在回应这一论断时，首先考察了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认为西方文化中存在“以视为知”（256）的现象。他指出，尽管希腊那喀索斯神话中早已存在对视觉痴迷的自省意识，但视觉耽溺后来还是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赋予了哲学和诗学上的法理性。与此相对，通过对从“耳”繁体汉字的文字学溯源，傅氏认为中国文化中的感官认知是以听觉统摄为前提的“闻声知情”（264）。基于此，傅修延将“听觉人”这一看似武断的说法解读为一种具有反聚焦特征的“非线性思维方式”（270）。

在傅氏看来，“听觉人”概念中所涵盖的不止听觉，其目的是体现一种以听觉统摄全身心的知觉方式。但从这位西方著名媒介学家所得出的“偏重视觉的、文明开化的美国人与部落式的、偏重听觉的东方文化”（麦克卢汉 107）这一结论中不难看出，其关于中国是“听觉人”的论断是建立在“视觉—听觉”“西方—东方”“文明—野蛮”等一系列二元框架之上的。这种典型的东方主义式论断也折射出西方听觉转向背后的哲学逻辑——视觉与听觉的二元对立。因此，尽管这一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视觉中心主义的统治地位，但由于其理论根基仍然未能摆脱视听二分法的对立结构，西方理论家所强调的听觉转向往往以反视觉的姿态获得合法性（如麦克卢汉宣称谷登堡的视觉中心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在杰伊（Martin Jay）看来，这种“反视觉话语”（antivisual discourse）普遍存在于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界，反

映了西方学界对于视觉支配地位的“深刻疑虑”(xxix)。基于对抗逻辑的理论模式固然具有其批判锋芒,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听觉范式非但未能真正解构视觉中心主义,反而催生了另一种具有结构同源性的“听觉沙文主义”(auditory/acoustic chauvinism),将听觉浪漫化为本真性和神圣性的唯一寄托,最终难免落入斯特恩(Jonathan Sterne)所批判的“视听连祷”^③(the audiovisual litany) 的本体论困境之中。这种对抗性二元论的窠臼,在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中诸如“生态转向”“物质转向”等各种本体论转向思潮中已然可见一斑。

为避免陷入视听对立的窘境,《听觉叙事研究》通过转向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听觉统摄现象的深入探讨实现了对西方二元论式听觉转向的本体论超越。傅修延在书中将听觉统摄现象与中国文化的“尚简、贵无、趋晦与从散”(271)等传统美学特征相勾连,从汉语语言深层的审美精神发掘出中国听觉叙事的内在文化依据。在傅氏看来,中国传统的感官认知机制将听觉视为一种近乎全方位的感知方式,而这些独属于中国文化的审美取向与这一听觉统摄机制密切相关。中国叙事自古有尚简的传统,流传至今的文史哲著作无不体现了古人之惜字如金。这不仅是古代文人对“谨言慎行”君子美德的践行,更意味着中国叙事对“大音希声”的推崇,强调剥离语言的冗余形式,使之得以在最小化的声音表达中保留最大的张力。而尚简至极便是贵无,孔子、庄子等人所说的“无言”“不言”并非真正一言不发,而是强调留白与虚静,使未发之声与潜在之响成为意义生成的重要来源,中国历史上唯一女帝武则天所留无字碑便在此列。趋晦则指向语言的含蓄与不显,这与声音进入感知时的隐约侧出特点不谋而合,二者都体现了典型的非线性、反聚焦的意义生成机制。从散则突出了汉语叙事去中心化的结构倾向,与听觉经验不受线性秩序束缚的流动性与弥散性相吻合。由此观之,中国文化的听觉统摄现象不仅体现为全天候的听觉感知通道,更彰显了一种与审美精神同构的认知方式,这一点无疑与西方听觉认知的反视觉机制大相径庭。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听觉叙事研究》从“物感”文化出发,将“万物自生听”这一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主张引入听觉叙事理论。中国文化中的“物感”所强调的并非人与物之间的对立,而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感应,其中体现的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论宇宙观。傅氏认为,听觉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人感应万物的主要方式,是因为“听”在中国文化中呈现为一种全身心的感知活动,因而能够作为人沟通万物的感官通道,文子、庄子等人提出的“神听”“心听”“气听”等区别与“耳听”的概念上便体现了中国哲学中“听”与“感”之间这种微妙的联系。傅修延将听觉叙事置于“万物自生听”这一本体论视野的理论建构,显然从根本上是区别于西方基于视听对立的听觉话语模式的。“万物自生听”意味着“听”成为天地万物自身的一种生成机制,而声音也不再是被叙事主体捕捉的对象,而是万物在其

^③斯特恩在《有声响的过去:声音再生产的文化起源》(*Audible Past: 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Reproduction*)的导言部分中指出,过去的西方学术界(包括许多标榜关注声音的学者)在论述声音时,看似在赞美听觉,实际上抱有一种公式化和教条式的偏见。他把这种相互对立的陈词滥调称为“连祷”(Litany,意指宗教式不假思索的反复诵读)。他认为,“‘视听连祷’将感官的历史塑造为一场零和博弈——在这种逻辑下,某一感官的主导,必然以另一种感官的衰落为代价。”(16)

生成与流变过程中自我呈现的方式。据此而言,《听觉叙事研究》提出的“聆察”则可以理解作为一种聆察者与万物之声互感的参与状态。这一倾听观念显然与西方反视觉的听觉模式相去甚远,因其强调的不是“谁在听”,而是“何以为听”以及“何生于听”。

尽管《听觉叙事研究》中“万物自生听”的听觉理论建构在本体论上是区别于,甚至超越了西方二分法式的听觉转向,但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西方科学化和体系化的声音研究理论,这种过于形而上学化的理论建构在具体的研究路径转化上仍存在不小的挑战。反言之,也正是在这一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的张力之中,中国听觉叙事研究显现出其作为一种具有开拓性的理论范式所蕴含的生成潜力与深化空间。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Pan Shuhao^{ID} <https://orcid.org/0009-0000-6919-3814>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Jay, Martin.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California: U of California P, 1993.

Schafer, Murray.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Knopf, 1977.

Sterne, Jonathan. *The Audible Past: 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Reproduction*. London: Duke UP, 2003.

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Fu Xiuyan. *A Study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21.]

杰伊:《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孙锐才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

[Jay, Martin.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Trans. Sun Ruicai. Chongqing: Chongqing UP, 2021.]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McLuhan, M.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Trans. He Daokuan. Nanjing: Yilin, 2011.]